

中国古典
小说人物
审美

美论

马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审美论

啸马 著

2031.12
《明清小说研究》 I207.41/80

第五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543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195432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审美论

嘯 马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华东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210 千字

1990 年 6 月第一版 199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 - 6000

ISBN7 - 5617 - 0357 - 0 / I · 028 定价: 2.80 元

目 录

绪 论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的历史和美学内涵	1
第一章	神·怪·人	13
	——神话和志怪小说人物论	
第二章	晋人风韵之美	25
	——世说新语》人物论	
	抗争人格之美与自然人格之美	25
	多角度的审美观照	33
第三章	爱情王国里的女性形象	37
	——唐传奇人物论	
	悲剧性格的崇高与优美	38
	寄情趣于意象和细节	49
第四章	市民意识的崛起与人物性格的蜕变	56
	——话本小说与拟话本小说人物论	
	历史悲剧向人间喜剧转化的艰难历程	58
	爱国主义的时代浪花	70
	资本主义萌芽的风俗画	77
第五章	史诗式宏伟画卷的人物群象	85
	——《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论	
	民族忧患意识的历史悲剧感	86
	“同而不同处有辨”与“犯中见避”	97
	情节、环境与性格的艺术辩证法	106
	文学语言的审美效应	117

第六章	亦幻亦真 亦神亦人	128
	——《西游记》人物论	
	理想英雄的性格美	128
	审美意象的奇趣、真趣、谐趣	135
第七章	孤愤写人生	144
	——《聊斋志异》人物论	
	呕心端为刺当时	145
	花妖狐魅寄深情	155
第八章	儒林群丑图和社会众生相	163
	——《儒林外史》人物论	
	功名富贵荼毒了的灵魂	164
	卓越的讽刺艺术	174
	理想的寄托 丑恶的反照	181
第九章	丑的揭露和美的升华	190
	——《金瓶梅》、《红楼梦》人物论	
	亵渎与叛逆	191
	灵与肉	201
	奴隶与奴才	211
	市井文字与诗笔	220
	现实主义的发展、丰富与深化	232
第十章	社会政治批判与审美化的两极偏离	244
	——谴责小说人物论	
后 记		259

绪论：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的历史和美学内涵

中华民族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们的祖先，生生不息，世代相承，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完善着人自身。随着人与自然、社会的联系的扩展、深化，人的内心世界不断趋于细腻、深曲、丰厚。内向的审视和外向的辐射，增强着心灵的力度。作家们用形象的、鲜明生动的画面，把握人与自然、社会的种种联系，从中探索人的心灵历程，构筑了小说文学的宝库。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林林总总，姿态万千。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过多少种人物类型，古典小说人物画廊里几乎就有多少种维妙维肖的形象。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同一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侧面，有过怎样不同的人生经历，命运遭际，精神品格，情感波澜，也都可以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系列这面时代的镜子里看到反映。它蕴含着无比丰富的社会历史的和美学的内涵，需要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发掘和探索。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社会内涵的衍变，和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保持着某种同步性（当然，也有不平衡性，这里着重探讨其同步性）。

中国古典小说的进程，唐传奇是一个明显的分界。此前的小

说还只是“残丛小语”，或者取神话、传说、笔记的形态，或者以寓言形式依附于哲学著作。这些轮廓简略、体制短小的作品，只是初具小说的某些属性，还处于孕育、雏型的状态。唐传奇则标志着小说的自觉和开始成熟。经宋元话本到明清长篇章回小说而逐渐繁荣。

循着小说发展的脉络，我们看到了各色人物形象的兴起，演变，消失。历史上一代又一代来去匆匆的“过客”，以富有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系列肖像画，留下了社会历史前进的轨迹。它那探幽烛微的细部描写，总揽全局的宏观体察，纵深发掘的历史观照，提供了一种带有生活丰富性、可感形象性、社会历史感的认识对象，一种合乎规律性的规模宏大的系统审美对象。

从神到人，这是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小说人物演变的鲜明特征。当我们的祖先以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结构开始创造历史的时候，人际关系简单纯朴，几乎没有进入审美视野。而严酷的自然却以神秘的异己的存在，构成了人类的巨大威胁。人们在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里，借助想象和幻想，展开了异常辽阔的思维空间。神话中的神和传说中半神半人的英雄便在这幻想的宇宙里驰骋，对宇宙奥秘、人类起源，作出神化的解释，表达了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这些神而人的超凡智慧和本领，是人类最早的审美理想的对象化，是初民跟自然搏斗的浪漫主义的升华。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人不是弱者，而是向自然主动进攻的强者。它显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无限潜能，它的乐观主义的预言，随着人驾驭自然力量的增强正逐步得到实现。人类的童年没有留下信史，神和英雄却为后人认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提供了具有审美典范意义的特殊的历史。

历史进入文明时代。阶级的对立，现实的苦难，社会矛盾的加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对退居次要地位，小说的人物形象也从神转变到人（就总的倾向而言，并不是说神的形象就此消失）。

如果把长篇小说出现以前的情形作一个总体考察，小说人物

形象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它的涵盖面扩散到更多的社会领域，并渐次向社会下层推移。

《世说新语》是魏晋上层士族群的自我写照。寄情山水，清高旷达，品藻人物，玄谈哲理，在深刻的时代苦闷里追求一种自然人格之美。其中也不乏积极思想的吉光片羽，或批评清谈废务，或不满新亭对泣，指陈时事，激浊扬清。可以说，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在这部笔记小说里得到了多方面的生动体现。这种精神风貌正是当时黑暗社会、险恶政治的折射。人物形象基本封闭在上层生活圈里，和人民的苦难是绝缘的。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小说人物形象至唐出现一大转折。经济的昌盛，都市的繁荣，科举制度给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开辟了途径，中外文化交流带来开放恢宏的精神气度等社会历史因素，加上文学内部规律性的发展，唐代文人“始有意为小说”^①，从而拓展了小说的社会思想容量和人物形象系列。以女性形象为例，唐以前虽然也有李寄、韩凭妻、吴王小女这样一些比较感人的小说人物，但无论是所处社会地位的多样，或者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对妇女命运和内心世界的刻划，唐传奇都显得更加丰富，更有深度。识英雄于风尘之中的红拂，慑藩镇之胆的红线，手刃仇敌的谢小娥，其人其事，为以前的小说所未有。爱情生活也体现着鞭挞门阀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社会内容。一些地位低微的女性，如霍小玉、任氏，她们对人的尊严和爱情的执着追求，在中国古典小说里第一次比较集中、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宋元话本，又“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②，曼衍至明朝的拟话本，更加众多的人物类型，他们活动的触角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领域，推进了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时期小说人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物形象的丰富、更新，其具有时代特征的标志，便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的崛起。这种新的文学现象，和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进程是一致的。商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尽管还比较软弱），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和《叠居奇程客得助》等许多短篇里有着细致、曲折的描写。前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文若虚飘洋过海，在偶然的机遇里——实际上是“物以稀为贵”的市场法则在起作用——，发迹成了大富翁。后一篇小说，写徽州商人程宰依照海神的指点，采取“人弃我堪取，奇赢自可居”的经营策略，只四、五年，便由只有十来两银子的本钱翻成腰缠万贯的巨商。海外冒险的生涯、巨额财富的追求，反映了商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也透露了社会价值观的新变化。这种市民的价值观渗入婚姻爱情生活，门第和贞操观念已减弱了过去那种神圣权威力量。卖油郎秦重，凭着他对女性人格的尊重和温柔体贴，战胜了王孙公子的地位和金钱，赢得了美妓辛瑶琴的纯真爱情。蒋兴哥终于原谅了被骗“失节”的妻子，几经周折，重归于好。这是市民意识对封建贞操观念的冲击。这些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行为方式，给中国古典小说灌注了新的时代气息。

明清长篇小说的兴起和繁荣，除了增添了活跃在洋场上的一批新的角色（主要在晚清的谴责小说里），赋予小说反映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认识意义之外；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便是实现了人物形象系列结构的群体化，人物之间矛盾关系的错综复杂化。短篇小说，一般只有几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只是从微观方面，从一个角度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长篇小说则可以容纳数以百计的人物，结成纵横交错的矛盾，从宏观方面和总体规模上，多角度地更加深刻地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三国演义》里各具性格的文臣武将谋士说客，在军阀割据和三国鼎立的纷争中，展开了军事、政治、外交斗争的丰富历史内容。《水浒传》一百零八条梁山好汉，和宋王朝腐朽统治集团众多贪官污吏的斗争，构成了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的宏伟历史画卷。《儒林外史》描绘的

知识分子众生相，对科举制度这种精神腐蚀剂和儒林群丑的卑劣灵魂，作了辛辣的讽刺。《红楼梦》塑造的典型形象，个性色彩的鲜明，思想内涵的丰厚，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高峰，直到今天，“仍然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最后崩溃阶段的历史宝典。”^①

二

别林斯基赞赏并引用了果戈理的话：“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短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别林斯基认为，“十足的民族诗人，他的精神包括民族性的一切因素。”^②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载体。

历史上各个时代精神的扬弃变异，封建宗法社会儒家思想的教化熏染，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的批判反思，人民生活土壤里奔涌的情绪潜流……，交汇成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和精神风貌。它是一个丰富驳杂、流变发展的动态综合体，分解积淀在文学史上各色各样的小说人物的心灵里。穷究这样奥秘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个别形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概括地探求小说形象反映的、具有文化精神传统形态的若干主要倾向。

浓厚的伦理色彩，内省体验以求得道德完善，是我们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重义利之辨，“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重良心对操守德行的调节，恪守合乎社会正义的原则，这种义务感和道德感，历来受到进步人士的推崇，并且作为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突现于小说的正面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里的关羽，曹操对他赐以爵禄，馈以金帛，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极尽拢络结纳之能事。但丝毫也收买不了关羽的心。当他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立即封金挂印，千里单骑，

①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

② 别林斯基：《1841年的俄国文学》。

斩将夺关，去追随穷愁破败的结义兄长了。毛宗岗称赞他“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就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表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重然诺的义气。人民之所以欣赏他，也正因为关羽和刘备“情同手足”而不是“名为君臣”的封建纲常。《水浒传》写农民起义的英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作者渲染的，也是人民心向往之的真诚人际关系。它如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等等寓审美理想于道德评价中的人物描写，在古典小说时有所见。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里的民族文化的人民性的精华。

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无与伦比的。故乡情，亲人恋，山川风物的精灵，历史文化的乳汁所哺育的爱国主义的丰厚内涵和真挚情感，是我们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的脊梁和骄傲。它不仅把一种富有历史使命感的时代精神注入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使人物的情操、品格或者在各民族之间自愿的亲近、融合中，或者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壮美的升华；而且作为一种情感的、道德的、文化的积淀渗透人物的深层心理。尤其在上层统治者挑起战争的时候，这种深层心理所迸发出来的道德力量和献身精神更是昂扬蹈厉，可歌可泣。杨家将一门忠烈，金沙滩血染疆场。男儿殉国了，“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征西”，百岁高龄的佘太君亲冒矢石，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说岳全传》的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岳飞“以身许国，志在恢复中原，虽死无恨”的壮烈誓言，这种不绝如缕的爱国主义思想光芒，照耀着许多使人激励奋发的小说人物形象。

列宁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①如果说，人民的社会实践产生了美好的理想、情操、道德等优秀民族精神，发挥了统治阶级赋予的普遍“正义”形式的伦理道德原则的积极方面；那么，统治阶级奉行的则是巩固其统治、维护其利益

^①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的另一种准则。他们对自己倡导的上述带有普遍“正义”形式的伦理道德也从来只是挂在口头上，并且横加践踏。这就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文化”的凶残性、虚伪性、欺骗性。

封建统治者一手举着“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恣意掠夺，蹂躏，杀戮。他们和他们的思想代表是民族文化糟粕的制造者，是毒化民族心灵的罪恶的渊藪。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纲常伦理，又炮制着“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死，不得不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种种精神枷锁，使广大人民陷在严格的人身依附中无谓地牺牲。《儒林外史》写王玉辉鼓励女儿自杀殉夫，女儿活活饿死了，他竟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认为这是“青史留名的事”。《红楼梦》的青年寡妇李纨，“她的存在在这世界中，若非为了教育儿子以及可能增加一座石碑坊外，一切都象是多余的。”这个被礼教强制而牺牲的典型人物，“用自己一生的凄凉酸苦换取的只是毫无意义的虚名”。^①正如鲁迅所抨击的那样，“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②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戴震“以理杀人”的概括，一语破的地揭穿了统治者“文化”的反动本质。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反映在古典小说人物形象里的消极精神素质，它来源于以儒家为主导的儒、佛、道渗透融合的文化思想的消极方面。儒家讲究所谓“文行出处”。“出”指积极入世，“处”是“明哲保身”。“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这种心态的两极表现。从后者，更生发出“乐天知命”“能忍自安”的避世思想。老庄的清静无为、放浪形骸，则与封闭的田园自然经济契合，

①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

② 鲁迅：《灯下漫笔》。

与恬澹枯寂的内心和谐，使我们民族心理染上了与现实若即若离的冷漠一面。发展到庸俗、市侩的末途，就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无是非，无善恶，无抗争，苟安，麻木，自私，象蜗牛躲进小壳似地闭眼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完全失去了变革进取的念头。这是一股浇灭生活热情和理想火花的冰水，结集“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长期地压抑着民族精神的生机。

三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的塑造，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美学传统。

“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是古代艺术家刻意追求的艺术境界。唐人张彦远云：“画人最难，……人物有生气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王国维强调：“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近人陈寅恪也说：“不专于形似”，应该使“其神情超乎物象之外，而寓其神情于物象之中”。说的都是这个意思。早在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就举了这样的例子：“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画不出西施动人的风采，孟贲勇猛的神态，不过是失却灵魂的躯壳。所谓“谨毛而失貌”，只求外形细枝末节的真，忽略内在精神的美，导致了许多平庸之作刻划人物的肤浅和死板。

围绕“传神”的审美要求，文学大师们有许多匠心独运的创造。他们善于捕捉人物内心世界最富感情色彩和个性色彩的特征，通过“以少总多”的艺术形象和细节，用白描手法予以鲜明生动的勾勒。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称赞作者描写应伯爵，“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俨然纸上活跳出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这种艺术魅力，首先来之于准确把握对象的深层本质的艺术观察和删削一切枝蔓的高度集中的审美视角。人物的一举手，一投足，一

顾盼，一开口，一缕情思以至一片氛围，都是活脱传神的，是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独有的。这种高度个性化的艺术概括，具有很强的审美指向性，一下就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并把它引到最能触发情感反应的焦点。《红楼梦》中探春给王善保家脸上的一掌；贾宝玉听到薛宝钗“仕途经济”的说教抬脚就走；宝玉挨打后黛玉那“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的“满面泪光”，以及“你都改了罢！”的深情试探；诉肺腑中贾、林之间心灵的撞击；贾府衰败前夕中秋赏月的凄凉气氛……，这些艺术形象、艺术境界所蕴含的生活容量、情感容量，经过了高度的提炼浓缩，传神的生命灌注，进入读者的审美再创造，所诱发的艺术感染力，确实达到了“追魂摄魄”的极致。

人物描写达到传神的化境，白描的笔墨简洁而空灵，有一种含蓄隽永之美。艺术形象所提供的想象空间广阔深邃，透露诗一般的抒情意味：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世說新語·容止》

寥寥数十字，几个富有象征性的疏朗、萧散的形象，与诗人嵇康的风度、情致、气质是那样默契，使人遐思无穷，美的享受如乐曲之余音盈耳，绕梁不绝。

优秀古典小说的人物塑造，非常注意适应读者的欣赏心理，表现出一种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气派。它很少用静止的叙述和概念化的介绍，也没有冗长的、打断情节节奏的心理描写。而是让人物在行动中，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矛盾联系中交织成波浪式迭进的情节。矛盾推动情节发展，情节展示人物性格。情节就是典型性格的历史。情节又不是平铺直叙的，往往曲折跌宕，奇峰突起，造成扣人心弦的动态之美。金圣叹关于宋江在浔阳江

遇险有一段批语：

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寻着村庄，却正是冤家家里，是第二追；搬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横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认得梢公，是第六追；舱板下摸出刀来，是追最后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脱一虎机，踏一虎机，令人一头读，一头吓，不惟读亦读不及，虽吓亦吓不及也。

这段情节描写，产生一种“不险则不快，极险则极快”的审美效应，使读者在紧张的悬念中体验一次“心灵的历险”，从而得到痛快淋漓的美的享受。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古典小说出色的情节描写，不单以它的“传奇性”取胜，而且深曲地体现了人物内心的颤动。例如《水浒传》写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林冲误入白虎堂，发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直到逼上梁山，这一连串事件促使林冲的心情从小康的安乐，到委屈求全的忍耐，熬出厄运的侥幸，终至愤怒，绝望，复仇。这里，没有主观说教或观念附加。人物的心理变化、性格发展，随着典型环境的合乎逻辑的推进而自然流露。达到事与情，物与心，情节和性格的水乳交融的辩证统一。

如果说，古典小说的人物描写，在它的萌芽阶段，还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那么，到了成熟阶段便已经成为“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机的总和。”^①典型性格的多重复杂组成因素，不是割裂的偶然的拼凑，而是以一种本质特征为主导的多因素矛盾统一的有机体。艺术巨匠们深知，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雷同是人物描写的致命伤。因此，他们所塑造的典型人物的复杂性格总是伴随着鲜明而深刻的个性内涵。正如金圣叹说的，《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

^① 黑格尔：《美学》第1卷301、302页。

形状，人有其声口”，“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也。”这虽不无溢美，但他强调人物描写的个性化，是很有见地的。为了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个性化的统一，杰出的小说家们以许多高超娴熟的艺术构思及艺术表现手段，丰富了中国小说美学。

从人物形象的风格色彩看，古典小说里的描写也是多样的：崇高，优美，阳刚，阴柔，雄放，隐秀，幽默，讽刺……，绚丽而纷繁。这多种色调里的主色，似乎要算悲壮的崇高之美。“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苦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①就是这种悲剧风格的说明。这是由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一是旧时代生活的悲剧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还没有达到足以摧毁反动统治世界权力的程度，人民的苦难便不可避免。悲剧性的历史必然产生悲剧性的艺术形象。二是作家遭遇的悲剧性。欧阳修有过这样的表述：“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结，其兴于怨刺，以遣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②坎坷潦倒的命运，使作家的心紧紧贴近人民的痛苦。三是人民对悲剧有着敏感的审美心理定势反应。愁苦凄怨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客体的审美属性、主体的审美情感、读者的欣赏心理，都趋向悲剧性。三者的契合，便孕育出一系列感人肺腑的悲剧形象。

中国古典小说中一些不朽的艺术典型，它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反映了历史的正义的进步要求和这种要求事实上不能实现的矛盾，从而导致了美好事物的被压抑、摧残，直至毁灭。贾宝玉和林黛玉，在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氛围里寻求明媚的春天，但垂死而仍然庞大的黑暗王国有似风刀霜剑，扼杀了这甦醒的嫩芽。类似这样的悲剧，启示读者更加看清了旧势力的恶浊，净化着人们的灵魂，并且在悲愤的痛感中燃起美好理想的火焰。和这种壮美的悲剧相比较相依附而存在，一些作家世界观的复杂和局

①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②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限，部分读者又想从皆大欢喜的“光明”中找一点安慰，往往使得作家编造出大团圆的结局。这种虚妄庸俗的老套，破坏了悲剧美的彻底性，造成了狗尾续貂的恶札。

要展开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的丰厚的社会历史的和美学的内涵，阐发它的全部特点、优点、缺点及其渊源继承关系，显然远非本书所能胜任。笔者的浅见，旨在抛砖引玉而已。